

读赵丰《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

“丝绸可以作为青铜器的载体,传输给上天”

探讨丝绸起源,也是探讨先民对天地生死的思考。中国丝绸博物馆名誉馆长、研究员赵丰先生,就在他的著作《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中,谈论到了早期的丝绸使用,乃“事鬼神而用之”。

他在该书第一章《丝绸起源的文化契机》提到,蚕的一生会经历卵、幼虫、蛹、蛾四种状态,“这种静与动之间的转化(包括眠与起),使人联想到‘天地生死’这最为重大的问题。卵就是生命的源头……而蛹的化蛾飞翔就是死后灵魂的去向。”张华《博物志》上说“蛹,一名魂”正是此意,蛹就是灵魂,是精神,是不死的。他认为,后来人们把得道升仙称为“羽化”,也是源于蚕蛹化蛾的联想。桑林,和从桑林中想象出来的神树“扶桑”,也都在庙堂和民间显得格外神圣。

他在书中写道,先民认为丝绸不是普通的织物,“穿着丝绸必然会利于人与上天的沟通。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所说的‘作茧自缚’并不一定是坏事,在当时应该是灵魂升天的必经之路。人们在死后直接用丝织物或丝锦包裹尸体,等于用丝质的材料做成一个人为的茧子,有助于死者的灵魂升天。”

因此,他介绍,丝绸最早的用途是作为尸服,但这种衣服没有凶意,反而有吉意,它是让灵魂升天的必需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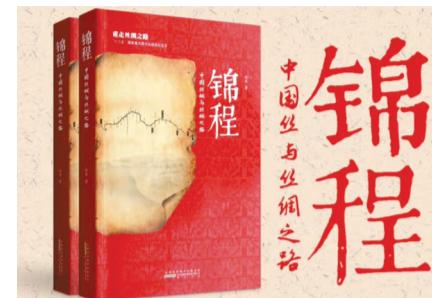
早期丝绸的第二个主要用途则是祭服,人们穿着蚕丝之服,事神明,祀先王,表示着“敬之尽”。

第三个用途是做祭祀时用的物品。书中介绍:“这里包括两类,一类是帛书或帛画,一类是与青铜、玉等礼器同等地位的丝织礼器。其用意应是把丝绸当作一种载体,把书画于丝绸上的内容或是其中包裹的物品传达到另一世界。最有名的帛书是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中央书写着文字,四周画有神奇的图像。另外,如两湖地区出土的龙凤妇女帛画、御龙人物帛画以及马王堆一号、三号汉墓中出土的两幅帛画等,都是用于引导死者灵魂升天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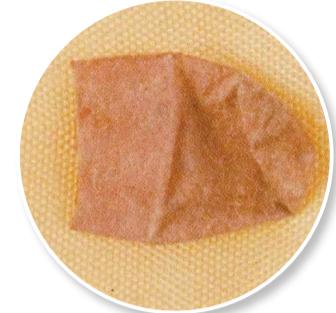
用于事鬼神。帛书也用于书写两国之间的盟书,《左传·哀公七年》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中国成语又云“化干戈为玉帛”。这里的玉和帛均是书写国书的材料,写后或埋在地下或是以火焚烧,表示可以上达于天。再看殷商时期的青铜礼器,经常可以发现青铜礼器由丝织品包裹后入葬的痕迹,这恐怕不是因为青铜器需要丝织物的保护,而是因为丝绸可以作为青铜器的载体,传输给上天。”

“因此,早期丝绸并非用作日常服饰,而主要是‘事鬼神而用之’,有着特殊含义。”

《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2016年由黄山书社出版,是一本对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的通论性著作,以中国丝绸为线索,大致按照时间的顺序,对通过丝绸之路进行的丝绸贸易,特别是技术、纹样的传播,作了详细的阐述。书中用非常简洁的语言和鲜活的例证,简明扼要地概述了以丝绸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的历史,没有拘泥于众所周知的丝路故事,除了交代一些必要的历史背景外,把浓重的笔墨放在丝绸上面,因此别具一格。



■《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赵丰著,黄山书社,2016年1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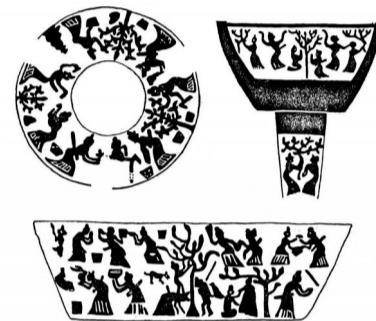


■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半颗蚕茧。

图片来自《锦程》



■王祯《农书》中的《先蚕图》。



■战国时期青铜器上的采桑图。图片来自《锦程》



■河姆渡文化“蚕”纹象牙杖首,浙江省博物馆藏。

藏品年代:新石器时代

藏品级别:一级

尺寸(cm):纵(口径)4.8,横(口径)4,高3.5

馆藏类型:牙骨角器

简介:俯视平面呈椭圆形,中开凿方形凹口,侧视如半圆球状。两侧下端近口沿部位钻凿有对称的二个小圆孔,其外表下端阴刻有一圈编织纹装饰带,中部阴刻有十分珍贵的“蚕”纹图像。如果真是“蚕”之纹,则此图当是我国最早的蚕纹图了。

读荣新江《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

“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的西域研究前沿作品。北京大学出版社介绍称,该书是作者有关丝绸之路的研究论集,分做五编,探讨汉唐丝绸之路的走向,丝绸之路与某些区域或城镇的关系;研究通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文化交流,包括中国与波斯、大食(阿拉伯)、印度、朝鲜半岛、日本的文化交往。作者利用对西域出土文书的谙熟,致力于探讨汉文典籍向西域地区的传播,这是前人比较忽略的丝绸之路研究的重要内涵。另外,作者还利用考古、美术、文献材料,研究了西方物质文明和宗教文化如何沿丝绸之路向东方传播,以及他们的传播者——粟特商人、于阗使者、景教徒,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讨论了丝绸之路上的宗教文化的并存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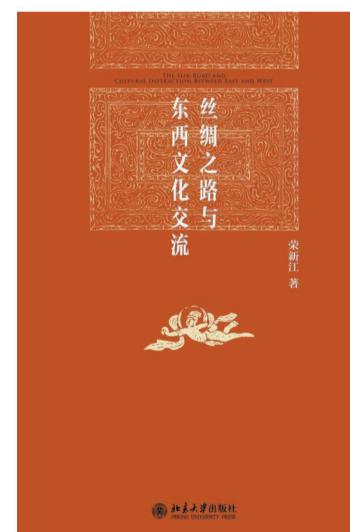
记者在重读此书时,前言中的一句话,依然印象深刻——“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

中国东面、南面是大海,西面是沙漠、高山,北面是戈壁、森林,不利于与外界的沟通。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自我封闭,经过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与外部世

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丝绸之路无疑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荣新江在前言中写道:“‘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赋予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的名字。但是,随着近代以来学术研究的深入、考古发掘的进步,丝绸之路的含义越来越广,范围也越来越大。的确,丝绸之路早在汉代以前就存在于中西之间,也不仅仅局限于中国与中亚、南亚的交往,还包括西亚、地中海世界,以及海上丝路所连接的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地;贸易物品也不仅有丝绸,还有各种手工制品、植物、动物、美术品乃至人口。因为中国盛产的丝绸的确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长期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所以‘丝绸之路’是指以中国为根本的古代东西交往的各条道路。‘丝绸之路’正如同丝绸一样,有时是一股一股的丝线,延伸开来,有的线路清晰,有的断断续续;有时又像一张大网,涵盖广阔,时时出现绚烂的织锦。因此说,不能死板地看待‘丝绸之路’,不同时代都有不同时代的丝绸之路。”

“汉唐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陆路从长安或洛阳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伊朗、阿拉伯和地中海世界;海路则从东南沿海出发,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到印度东西海岸,再到波斯湾、阿拉伯半岛、红海和地中海,乃至北非东岸。但是,丝绸之路是一条活的道路,由于政治、宗教、自然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丝绸之路也选取不同的走向。比如南北朝时期,占据中原北方的鲜卑统治者,不仅与南朝处于敌对状态,而且与其北面的柔然汗国也经常兵戎相向。我们曾经在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发现一件公元474—475年阚氏高昌王国护送各国使者出境的记录,短短数行文字告诉我们,当时来自南朝刘宋、塔里木盆地的焉耆和子回国、西北印度的乌苌和中印度的婆罗门国的使者们,要前往蒙古高原的柔然汗庭,都要经过高昌(吐鲁番)。这片文书,为我们勾勒出公元5世纪下半叶南北、东西交往的路线,也就是说,当时虽然兵荒马乱,但连通东亚、北亚、中亚以及南亚的丝绸之路,仍然通畅无阻。”



■《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荣新江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第1版,2022年3月新1版。